

仅供内部学习交流使用

理论宣传月报

2016年第7期 总第85期

厦门大学党委宣传部 编印

2016年9月

目 录

治国理政新思想专题

-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实际.....1
- 作风建设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扎实推进、成效显著.....7
- 怎样看待中国经济新常态.....13
-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部署.....20
- 五大发展理念：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由大变强之道.....24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30
- “一带一路”的三大主力军.....35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实际

李君如

来源：《经济日报》 2015年6月11日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有什么样的背景和逻辑？

同任何科学理论形成和提出有一个过程一样，“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也有一个过程。

党的十八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鲜明而又具体地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这次党代会形成的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集思广益，竭尽全力，为实现这一宏伟的战略目标而奋斗。短短两年多时间，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

一是思想先行，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党的十八大后，先是通过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从高层做起，一面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一面把各级干部的行为规范到“八项规定”上来；接着，把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追求联系起来，提出了为中国梦而奋斗的宏伟理念，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上下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奋斗的热情。

二是秉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要求，大力整顿党的作风和干部队伍。在统一思想和行动的过程中，党中央高度重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雷厉风行地进行“打老虎”、“拍苍蝇”反腐败斗争，并把这两件大事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突显了党中央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治党格局和治党思路。

三是在从严治党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举措。这两年多，我们党在处理内政外交国防和治党治国治军各种复杂问题时，高瞻远瞩、驾驭全局，条分缕析、精心谋划，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特别是在2013年和2014年通过中共中央全会决策的形式，制定和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两个纲领性文件。这两个重要决定，一是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两个“总目标”，贯穿着同一个主题词：“治国”。一是要通过制度现代化从根本上破解治国难题，一是要通过法治谋求国家长治久安。

认识来自于实践。正是在这样的实践基础上，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第一次提出了“四个全面”，并在2015年2月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把“四个全面”定位为党中央的“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战略布局的论述，至少包含三层深刻的道理：

第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这“四个全面”，每一个“全面”都有丰富的内容。在习近平总书记对“四个全面”的论述中，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因此，这“四个全面”虽然每一个“全面”都有重大战略意义，但又有“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之别。“战略举措”是为“战略目标”服务的，或者说，“战略举措”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全面深化改革也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好，全面从严治党也好，都是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之间的关系。

清醒地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台阶，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可以说，这是我们肩负的崇高、神圣而又艰巨、紧迫的历史使命。现在距离2020年只有五年多时间了，或者说，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其中在经济目标中有一个硬指标，这就是我们过去说的“两个翻番”，即“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按照十八大时测算，今后8年年均增长7%，国内生产总值就可以翻一番；年均增长6.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从目前来看，尽管这两年

经济下行，但还在可以实现我们奋斗目标的区间之内。比如 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7.4%；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 10.1%，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 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 11.2%，这些数据都在合理的区间之内。但是，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在经济转型的同时如果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是会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我们不唯 GDP，但不能没有含有较高质量和效益的 GDP。所以，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所有的举措，都必须牢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第三，“四个全面”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

“四个全面”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战略举措要服务于战略目标，实现战略目标也不能偏离战略举措的要求。比如讲全面小康，讲发展，不能违法乱纪，不能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除了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之间要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三项战略举措之间也要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而不要相互分割、相互冲击、相互抵消。

“四个全面”提出的重大意义

从理论上讲，“四个全面”的提出，标志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完善和成熟。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外访问时，曾引用先哲老子的话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烹小鲜，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事实上，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更难。中国不仅国土大、人口多，而且处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同时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又千差万别，尤其是在改革激发巨大社会活力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问题，社会矛盾有所增加，情况异常复杂。这个大背景，决定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解决的最大课题是，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

为解决这一时代性的课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着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夙夜在公、勤勉工作，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在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过程中，一方面深刻总结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一方面认真应对今天面对的挑战考验，集中回答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这一根本性问题。

特别是，“四个全面”抓住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治国理政的目标、动力、保障、领导这四根支柱，形成了治国理政的科学思路和基本框架。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脱胎于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路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又在“全面”和“深化”上发展了“强国之路”和“根本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是在坚持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同时，在“全面”和“推进”上发展了这一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全面从严治党”同样在“关键在党”这一根本问题上坚持和发展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四个全面”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

从战略上看，“四个全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显而易见，这篇大文章的主题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续写的重点一是“坚持”、二是“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重点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上。这里有必要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之间的关系，做一点研究和说明。“总布局”与“战略布局”，字面上似乎差不多，其实是两个概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我们最初认为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布局，后来认识到社会建设特别是和谐社会建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使得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从“三位一体”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布局，再后来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决不能等闲视之，又把它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布局。这样，到十八大我们就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后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对此作了深刻阐述。他说：“强调总布局，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正因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有了这种“全面”的认识，我们对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也有了新的认识。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要求，一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是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三是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四是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五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显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五个方面的新要求，体现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四个全面”是实现“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阶段性目标的战略布局。

从实践上讲，提出“四个全面”就是要求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战略布局下落实好中央的每一项重大决策。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最重要的是在实践指导上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里，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执行这些决策、落实这些决策，都必须把它们放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去把握，而不能偏离这个战略布局，更不能冲击这个战略布局。二是就这个战略布局而言，也必须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而不能只讲一个“全面”、不讲其他三个“全面”，更不能把其中一个“全面”与其他“全面”对立起来。

这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大局观。我们面对的“实际”，有“西瓜”，也有“芝麻”。抓“西瓜”是从实际出发，抓“芝麻”也是从实际出发。我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不能看不到“芝麻”，但是从担负领导责任的要求来说，决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在这个意义上，从实际出发，最重要的就是要善于把握大局，善于把自己承担的工作放到全局中去把握。因此，学习领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重要的就是自觉而又认真地落实党中央的每一项重大决策。

“四个全面”和老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2014年“两会”前夕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示：当年网民投票关注话题前几位分别是：收入分配、反腐倡廉、医疗改革、养老改革、环境治理，占比分别为6.97%、6.55%、6.51%、6.38%、5.91%。

这个调查反映了老百姓最在意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四个全面”大局中的问题，最终要靠全面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解决。所以，“四个全面”不是跟老百姓没有关系，而是有重大关系。事实上，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和提出过程中，老百姓已经得到了许多实惠。比如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之年，这一年实施的许多改革举措，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就业人口，伴随经济结构的调

整，城镇新增就业 1322 万人，比原定的 1000 万人目标超过了 322 万人；最低工资标准，全国有 19 个省（区市）提高了标准，平均增幅为 14.1%，23 个省份调高了工资指导线；收入水平，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比上年增长 9.8%，农村居民人均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比上年增长 5.6%，人均第三产业经营净收入增长 16.3%，非农产业经营收入成为农村居民增收的重要推动力量；财产性收入，2014 年城镇居民出租房屋收入同比增长 20.9%，农村居民人均转让土地经营权收入增长了 40.3%；养老金，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70 元，城镇居民医保人均政府补助达到 320 元，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已实现“十连涨”，月人均水平超过 2000 元。所以，“四个全面”，形式上很简约，实际上是同每一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事事攸关的战略布局。

综上所述，我们不论是搞党务和行政工作的，是搞企业的，还是做工务农的，或是在上学的，或是退休在家的，都应该了解、支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当支持派、推动派。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作风建设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扎实推进、成效显著

秋石

来源：《求是》 2016 年第 4 期

核心要点：

■ 中国共产党近 95 年的历史反复证明，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作风问题的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作风优良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都要发扬光大，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 作风建设坚持从“小”抓起，如一顿饭局这样的“小事”，一抓就是 3 年多，不仅没有“一阵风”，而且“越往后执纪越严”。抓作风建设，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落实到位。

■ 各级党委对新形势下作风建设重点抓什么、怎么抓的认识更加准确，集中教育和经常性工作都有新的套路、积累了新的经验。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不仅提高了对加强作风建设的思想认识，增强了落实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而且明确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的思路和方法，丰富了管党治党经验，着力把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起来，把经常性教育与集中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的重要讲话中，明确了 2016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五大工作要点。一是尊崇党章，严格执行准则和条例；二是坚持坚持再坚持，把作风建设抓到底；三是实现不敢腐，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四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五是标本兼治，净化政治生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总揽全局、运筹帷幄，统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坚持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党中央着眼于新的形势任务，围绕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把抓作风作为“先手棋”，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重要内容，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坚持坚持再坚持，把作风建设抓到底”，使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确保我们

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把作风建设作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着力点

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地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不仅充分表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而且指明了推进党的建设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把作风建设作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道义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科学理论，道义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近 95 年的历史反复证明，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作风问题的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作风优良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都要发扬光大，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回应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以此决定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时期重大发展关头的工作切入点，这是一条成功经验。当前，人民群众对有的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作风和廉洁问题反映最突出，必须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回应广大人民群众期盼，巩固党的执政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服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最大决心、久久为功的韧劲，始终绷紧作风建设这根弦，紧紧抓住作风建设这条主线，以作风建设带动全面从严治党，一手抓反“四风”、一手抓反腐败，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切实实现作风建设根本性好转，确保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作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开始就把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一以贯之，步步深入，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精神狠抓作风建设。

一是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加强作风建设从八项规定下手。2012年12月4日，刚刚就任的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从中央政治局带头做起，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八项规定是给中央政治局定的，但其精神适用于全党。这是新一届党中央加强作风建设的切入口和动员令。中央领导同志带头示范，各地区各部门迅速行动，经过持续努力，八项规定精神深入人心，成为作风建设的代名词，成为改变中国政治生态和社会面貌的标志性话语。

二是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四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这次活动从2013年6月开始，到2014年9月底基本结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以整风精神对党内思想之尘、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了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四风”问题得到有力整治，达到了预期目的，在党的建设史上写下重要一笔。

三是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以“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为主要内容的专题教育，这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延展深化，是作风建设的再启程、再出发。这次专题教育从2015年4月份启动以来，已进行了8个多月。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贯彻党中央部署，按照深入学习贯彻、突出问题导向、贯彻从严标准、坚持以上率下、确保取得实效的要求，聚焦“三严三实”，着力解决不严不实问题，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党性上进行了又一次集中“补钙”和“加油”，特别是绷紧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增强了践行“三严三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化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不断巩固拓展作风建设的成果。

这一切，充分显示我们党在作风建设上一鼓作气、一抓到底的决心和恒心，以高标准严要求全面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全面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有力地促进了党的建设，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大振。

回顾总结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抓作风建设的历程，工作务实扎实，举措果断有力，特点格外鲜明。一是突出重点，抓住要害和关键，点准穴位，打准靶子。作风建设首先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把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作为目标，扭住“四风”不放，抓住重要节点，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正风反腐给老百姓带来更多获得感。二是从中央做起，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层层立标杆、作示范。3年多来，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从身体力行八项规定，到全程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再到带头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用“讲认真”的精神、“有担当”的行动，使真理力量和道义力量高度结合，形成了巨大的“头雁效应”。三是见事见人，既抓思想引导又抓行为规范，不搞形式、不放空炮。作风建设坚持从“小”抓起，如一顿饭局这样的“小事”，一抓就是3年多，不仅没有“一阵风”，而且“越往后执纪越严”。抓作风建设，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落实到位。四是上下互动，强化组织管理和群众监督，形成强大势场。在推进作风建设中，既强化党内监督，强化巡视监督，通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努力，不断提高党解决自身问题的本领，又敞开大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使作风建设在党员干部同人民群众的互动中有效加强。五是执纪问责，严肃查处和曝光典型案件，形成高压态势，形成严的标准和氛围。3年多来，党中央在推进作风建设中坚持“严”字当头、动真碰硬，言出纪随、从严执纪。严肃查处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等违纪违法案件，消除了党内重大政治隐患，彰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实现中央巡视、派驻两个“全覆盖”，打消“反腐有禁区”的疑虑。管党治党层层传导压力，用问责倒逼“两个责任”落实。六是驰而不息，一环扣一环抓，不间断抓，努力形成长效机制。3年多来，作风建设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着力在纠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上见到成效，在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上见到成效，在构建规范化、制度化的长效机制上见到成效，保持了我们党长期形成的良好形象。

党的作风建设呈现出喜人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凝心聚力、直击积弊、扶正祛邪，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再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把作风建设贯穿始终，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使党风政风呈现新气象，深得党心民心。

一是通过扎实努力，全党对党风廉政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更加深刻，抓作风、转作风的自觉性普遍增强。特别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坚持把学习教育贯彻始终，按照中央要求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注重学习先行、思想发动，在立根固本上下足了功夫，广大党员干部精神上补了“钙”，促进思想认识提高，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不断增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断增强践行“三严三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自觉祛除歪风邪气、树立清风正气，挺起了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

二是各级党委对新形势下作风建设重点抓什么、怎么抓的认识更加准确，集中教育和经常性工作都有新的套路、积累了新的经验。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不仅提高了对加强作风建设的思想认识，增强了落实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而且明确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的思路和方法，丰富了管党治党经验，着力把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起来，把经常性教育与集中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认识到抓作风建设要返朴归真、固本培元，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用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管住全体党员；作风建设一定要咬住“常”、“长”两字，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三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得到有力整治，领导干部中不严不实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一大批“老虎”、“苍蝇”被绳之以党纪国法，不敢腐的氛围总体形成，不能腐、不想腐的工作正在深化。3年多来，我们党聚焦“四风”，突出问题导向，以解决问题开局亮相、以正风肃纪先声夺人、以专项整治寻求突破，出重拳、用重典，不断拧紧螺丝、上紧发条，刹住了“四风”蔓延势头，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政治生态清朗起来。

四是党风廉政建设制度法规更加完善，制度“笼子”扎得更紧，制度执行力和纪律约束力明显增强。3年多来，我们党在推进作风建设中及时把成功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制度利器。坚持解决问题与建章立制相结合，坚持健全制度与执行制度相结合，以转作风改作风为重点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中央相继出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公务用车改革等一系列制度，颁布实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强化了对不良作风的刚性约束，按规矩办事、按规矩用权意识显著增强，党的纪律更加严格，党内生活更加规范。

五是党风廉政建设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促进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风清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3年多来，随着作风建设的扎实推进，推动了党风民风社风明显好转，在全党全社会弘扬了正气，使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和形象进一步树立，党心民心进一步凝聚，厚植了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形成了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党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把抓作风作为“先手棋”，一子落、满盘活。中央制定实施八项规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这些重大举措都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创造性实践，为新形势下我们党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提供了坚强保证。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如今，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要对“四风”问题和一切腐败现象穷追猛打、除恶务尽。继续前行的集合号已经吹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的重要讲话中，明确了2016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五大工作要点。一是尊崇党章，严格执行准则和条例；二是坚持坚持再坚持，把作风建设抓到底；三是实现不敢腐，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四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五是标本兼治，净化政治生态。我们坚信，以驰而不息精神通过作风建设带动全面从严治党，又以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确保“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顺利推进，一定会扫除“四风”与腐败之霾，给党、国家、民族带来风清气朗的政治生态。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这个宏愿一定能够善作善成。

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精神状态，以从严从实、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的工作状态，确保“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庄严承诺落地生根，确保全面从严治党的军令状克期克成。

怎样看待中国经济新常态

李建波

来源：《学习时报》2014年10月23日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中央对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重要判断。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正确认识理解，把握经济发展趋势，保持平常心，着力于促改革，调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才能更好地引领和服务于各项经济工作使经济增长以适宜的速度平稳健康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5月在河南考察时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这是总书记第一次以“新常态”来描述当下的中国经济，此后在他亲自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在听取一些专家、学者的发言时，他又一次提到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新常态”的中国语义

“新常态”并非一个新词，2009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曾用“新常态”这个词，来描述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缓慢而痛苦的经济恢复过程，并断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再也回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低增长、高失业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缩减、资本回报率降低。此后，“新常态”就成为经济领域的一个流行词，国内学者也开始使用这个词，并将其赋予新的涵义，用以阐释、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新趋势。

从中国语境来理解，“新常态”中的“新”，意味着不同以往，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别于过去的阶段性新特征；“新常态”中的“常”，则意味着相对稳定，表明中国经济会适应新的变化、在新的平台上继续平稳发展。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从本质上来看，其核心要义是指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减速换挡，毅然告别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向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全力迈进、全面转型；它与西方语境中“新常态”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显然有所不同。也就

是说，它不是要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所谓繁荣状态，而是要在全面的结构性改革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重塑新的发展源泉，它的主题是“全面改革”、是“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

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虽然借用了“新常态”这个词，但其涵义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它所表达的是中央对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本判断和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态度。从阶段性特征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这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换挡已是大势所趋，或者说是一种“新常态”。问题倒逼改革，在此背景之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会产生一个“结构调整阵痛期”，宏观政策的转型也需要一个“前期政策消化期”。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宏观政策的基本基调是“稳”，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不会出台，中央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的事实有清醒的认识、对结构调整的阵痛也有足够的承受力和容忍度。

至此，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涵义作一个简单的概括：中国经济在经历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支撑发展的各方面条件都在改变，潜在增长率也趋于下降，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必须适应新情况、新变化，在新的环境中、新的平台上实现新的均衡，以适宜的速度、适当的方式、更高的效率、更好的质量，继续保持健康、平稳的发展状态，是谓新常态。

“新常态”的现实表征与理论解析

从现实表征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不断呈现出一些看似矛盾、但似乎又合乎逻辑的新现象。主要表现是：虽然经济增速在回落，但物价水平却相对稳定，就业状况不但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在出口需求大幅下降，制造业因全面产能过剩而处于萧条的情况下，服务业依然保持了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整体经济景气下滑的过程中，“刘易斯拐点”逼近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势头不仅没有回落，反而在“民工荒”不断蔓延中保持了较高的涨幅。

上述三大典型现象，用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显然解释不通，但潜在增长理论和结构转换理论却能把个中的缘由说清楚。

首先，潜在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总是和潜在增长率密切相关。所谓潜在增长率，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

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往往会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资本投入、劳动力状况、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其中，技术进步对潜在增长率具有长期的、决定性的影响，而资本、人力、资源在既定的潜在增长区间，对短期增长率具有重要影响。过去，我们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廉价的劳动力、充裕的自然资源，再加上比较宽松和有利的技术引进条件，使得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在较长时间内都处于较高水平，从而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金融危机以后，资本回报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约束趋紧，特别是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简单地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已经没有多大空间，技术进步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创新。所以，在技术创新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必然的，GDP增速回落也在情理之中。可见，此轮的经济下滑，与此前的增长速度回落并不相同，它不是短时周期波动造成的，而是阶段性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产物，尽管增速下降，但发展还算平稳，尤其是物价水平与就业状况，没有出现周期性的大起大落。

其次，从结构调整与转换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时候，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一般都高于第三产业，所以在服务经济比重不断增大、工业经济比重日趋缩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也会趋于下降。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比第二产业增幅高0.5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9%，高于第二产业4.1个百分点。鉴于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它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更强，同样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容纳的就业量约为1058人，第三产业为1348人，后者超过前者约30%。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状况反而有所改善；经济景气下滑，人员工资仍在增加的奥妙所在。

“新常态”的四大趋势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有为，正在向积极的方向变化。其中，有四个方面的趋势，尤其值得关注。

经济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显著标志就是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经济发展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普遍规律，同时也是经济结构再平衡的最佳时间窗口。譬如日本，在上世纪50—60年代，曾经经历了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接近9%；但在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以后，经济增速就开始下降，70、80

年代大致为 4.29%，90 年代以后只有 0.85%。再比如我国的台湾地区，在经历了上世纪 60—70 年代高达 10% 的经济增长以后，虽然速度有所下降，但在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仍然保持了年均 7.6% 的中高速增长，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降到了 4.3%。

其间，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先后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完成了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实现了经济的全面转型升级，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所以，正如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所言，“对中国来说，要回到过去 30 年两位数增长的模式，既无必要，也不现实。事实上，备受期待的中国经济再平衡已经开始，增速放缓是这一进程的自然结果”。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华盛顿智库中国问题专家彼得·伯特里尔也认为，中国 GDP 增速放缓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内部平衡。对于中国而言，GDP 增速放缓出现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点上。

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新常态”下，经济减速其实只是表面现象，背后反映的则是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即由过去的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相互作用方式。因此，从要素配置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增长方式；二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质量型增长包含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因素，内涵更加全面，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更涉及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分配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是对整体经济增长过程优劣的价值评判，是一种更为科学的发展方式。

在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发展的质量会更高、效益会更好、可持续性会更强。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我们继续以往的发展方式，我们会有更高的增长率。但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因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发展动力：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与增长方式转变相伴而行的是发展动力的转变：数量型增长主要依靠要素和资本投入去驱动，而质量型增长则需要创新去驱动。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也在倒逼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一般来说，经济增长主要受四大要素影响，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

本投入、创新与技术进步。通常情况下，随着资本、劳动、资源等投入要素的增加，产出也会随之而增加。但随着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临界点后，收益递减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产出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这个时候，就必须以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减缓或阻止收益递减现象，使相同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

以我国为例，1998—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2013年，则降至12.2%；2014年1至5月，仅为5.8%。这充分说明，经过了30多年的数量型增长，要素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极限，未来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动力，必须把发展动力转到创新与技术进步上来，让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宏观政策：由刺激增长转向区间调控

在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常态、经济发展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的背景下，宏观政策的转型也就势在必行了。过去，一遇到经济增速下滑，我们就会动用一切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以“保增长”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虽说在短期内可以把经济增速拉起来，但由于政策变化太快、太频，往往会打断经济发展的正常节奏，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不明，常常会无所适从。2013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这实际上就是宏观政策转型的开始，意味着中央调控经济的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过去的以“保增长”为中心转向以“调结构”为中心，稳增长、调结构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轴。

所以，尽管从去年以来到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一直较大，但中央并没有采取强刺激的调控措施，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中央又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宏观政策的“稳”与微观政策的“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区间调控的基本思路。调控的上限是“通货膨胀”，下限是“就业”，只要通胀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失业率不超出充分就业的界限；或者说，只要经济运行大体处在合理区间，就不会轻易动用强刺激政策，更不会为了零点几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而干扰总体工作布局。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将更多地聚焦于促改革、调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适时的“微调”与“预调”将会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常态。

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

适应“新常态”，关键是在战略上要有定力，客观地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平常心对待一个并不算快，但却自然而然、真实有效的增长速度；运用底线思维，从最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

沉着冷静，不急不躁。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内在的规律，我们只能遵守，不能违背。我国已经保持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其间，也从低收入水平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客观上讲，经济发展也确实到了阶段性调整时期。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经济发展也较快；而由中等收入阶段再进一步，跃升到高收入水平国家或地区，则要困难得多，经济增速也会随之而下降，其间所遇到的挑战，在经济学上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政策对路，措施得当，就会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进入高收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比如日本和韩国；否则的话，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停滞不前，比如拉美的一些国家。

我国目前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一定要冷静思考，沉着应对，千万急不得。尤其是要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以平常心对待经济增速放缓，不必为此而过分纠结。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早有精辟论述。2013 年 4 月 8 日，在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他就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说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维持超高速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太大，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说不必要，主要是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实现我们确定的到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 7% 的增速就够了。因此不必要追求超高的经济增速。

增强信心，发挥优势。虽然我国正在经历“三期叠加”的严峻考验，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总体来说，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发展空间、增长潜力依然巨大。我们有 13 亿多人口，内需充分迸发所形成的消费潜能无可限量；我们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 50%，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依然强劲、空间依然广阔；我们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技术进步对未来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只会对未来更有信心。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会坚定地、充满自信地说：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速处在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内；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内生动力；信心来自于亚太发展的良好前景。

积极进取，主动作为。“新常态”下，经济只是放缓，并不意味着低迷；平常心也不等于平庸心，更不等于被动适应，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新常态”是新尝试、新探索，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更加紧迫，要求更加严格，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改革不彻底、宏观调控思路要创新、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增强等一系列的难题，都需要我们以饱满的热情，主动谋划，主动作为。珍贵的战略机遇能否变成现实的发展成果，也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结构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以背水一战的气概，把改革进行到底。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部署

李文

来源：《经济日报》 2016年5月6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经济新形势、科学判断我国经济发展新走向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既是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和必然要求，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和丰富发展。在思想理论上强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意义、目标任务的认识，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增强改革的自觉性坚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1. 如何认识供给侧与需求侧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与消费是辩证统一的，生产决定消费的对象、方式、质量和水平，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推动生产的发展。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实际上是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另一种表述。一方面，供给与需求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另一方面，供给和需求又相对独立，具有各自运动规律，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条件有所不同。因此，供给和需求的相互平衡、相互促进，是经济良性运行的重要条件。

正确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侧重供给还是侧重需求，要结合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研判把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种种挑战，既有供给问题，又有需求问题。从供给方面看，资源、能源、环境约束加大，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企业创新能力不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既存在低端产业的严重产能过剩，也存在着中高端产品和现代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不足。从需求方面看，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外需拉动作用大幅下滑；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消费需求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需求日益呈现多样化，而当前的生产力水平难以满足人民对物质产品 and 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内需有效提振经济增长的力度减弱。综合分析这些实际情况可以看出，供给端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从供给端发力推动经济发展，既有迫切性，也有针对性。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调整、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等方面迫切要求，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高层次的需求，并通过发展生产创造出新的更多的需求，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因此，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

时，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优化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通过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创造新供给，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2. 如何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本质区别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绝不能混为一谈。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诞生、80年代初期流行于美国的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供给学派从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渊源出发解决经济问题，其核心思想是：认为自由市场会自发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自动达到最优的经济增长；认为政府活动是无效的甚至有害的，因而反对政府干预，主张放松政府管制；主张通过减税特别是减少对富人的征税、削弱社会福利、严控货币发行等政策刺激投资，恢复市场活力。供给学派片面强调“供给方”管理，认为供给会自发地创造需求，是对西方自由市场理论的简单重申，其政策主张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在西方经济学界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注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和发展，与西方供给学派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和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而供给学派则认为自由市场会自发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反对政府干预和调节；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导向、强调守住民生底线，而供给学派则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实行公共部门私有化；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税主要是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并通过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增加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实施灵活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而供给学派则主张减少对富人征税、实施紧缩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总之，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供给学派的主张则旨在恢复自由资本主义的秩序，服从服务于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因此，两者具有本质区别。

3. 如何认识宏观调控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

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都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但两者的运行机理和效果存在较大差异。需求管理是一种间接宏观调控措施，主要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对需求进行调控，靠需求的变动引导供给，其逻辑是政府调控需求、需求引领供给。而供给管理是一种直接宏观调控措施，主要基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应的产业政策，通过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

对供给进行直接调控，其逻辑是政府调控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两者最大的不同点，是供给管理具有较强的行政强制性，调控目标明确，精准发力，速战速决，这也是供给管理的最大优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就要从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各自特点出发，结合经济运行实际，将两者有效结合起来，综合施策，实现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要削弱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完全由市场调节经济结构。如果单靠市场调节来完成“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必然会加剧经济失衡，出现极其严重的企业大面积倒闭潮，导致经济发生断崖式衰退，出现大量失业人口，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这正是马克思批判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通过经济危机解决比例关系失衡的做法。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加强以政府直接调控为特征的供给管理，这样才能有力、有效地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结构调整优化。

要充分发挥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把握正确方向的核心作用。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优化经济结构，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发展生产、提高效率与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更好地结合起来。

要充分发挥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抓重点、抓关键环节的牵引作用。把新的发展理念体现到政策制定、工作安排和任务落实的各个方面，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发挥政府的管理职能和关键作用。

4. 如何认识优化结构与提高经济总量的关系

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经济发展既要求总量的增长，又要求结构的优化，结构优化有利于推动总量持续、快速增长，总量的增长要求结构不断优化、实现更高层次的增长。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也要看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明显差距，大而不强、快而不优、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缺乏等问题依然突出，而且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提高经济总量，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至关重要。从现实情况看，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做大经济总量，

也有利于消除庞大的库存和过剩的产能，降低金融债务杠杆，控制金融风险，补齐科技、生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建设等诸多短板，兜住民生底线，减轻结构调整的阵痛。

当然，提高经济总量不能通过重复建设、低水平建设来实现，我们需要的是质量高、效益好的经济总量。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既有外部冲击的影响，也有内部自身矛盾；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问题。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重要领域的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通过创新打造发展新引擎，创造一个新的更长的增长周期。同时，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为我国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奠定坚实基础。

5. 如何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也是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保证。我国应对各种经济风险和危机的实践证明，国有经济在规避经济风险、应对经济困难等方面具有特殊优势和作用，是其他所有制经济不能代替的。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可以使我国有条件实施大规模政府投资、大力度结构调整和大范围社会保障，引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使国家在资源、能源、交通、通讯、新技术、金融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保持必要的控制力，支撑国民经济的运行；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提高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重大风险的能力，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建立比较和谐的劳动关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

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核心不是削弱国有企业，而是要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产能过剩、库存压力加大等突出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与企业所有制性质并无多大关联，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存在这些问题，都面临着转型升级。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能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主导力强、辐射面广的重要作用，模范执行各项改革决策，成为改革的主力军和先行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能脱离国情、脱离实际、走“一卖了之”的错误道路，既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又要注意避免市场的盲目性，着力在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益和质量上下功夫，提高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

五大发展理念：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由大变强之道

韩庆祥 陈远章

来源：《光明日报》 2016年1月20日

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既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它是由大国成为强国对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有其活生生的实践基础，它是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又有其内在的现实基础，它是新常态背景下力求解决我国调结构、转方式进程中的主要矛盾、根本问题和发展短板的本质要求，还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它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更有其牢固的政治基础，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我国发展全局深刻变革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因而，研究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当代中国发展全局的一个战略性课题。本文主要从整体上来理解和把握“五大发展理念。”

关系发展全局——涉及发展的基本关系和基本方面

创新，讲的是发展动力，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是解决我国发展的“虚胖”进而由“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这里讲的创新，涉及的主要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显然，这里主要讲的是发展动力问题。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指出：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显然，这主要讲的是社会环境与人的创新之间的关系，如社会为人的创新提供种种供给等。在这里，社会流动机制是最为重要的。如果全社会能形成一种“由下向上”的流动机制，人们通过努力奋斗、能力发挥和业绩贡献就能由下层进入社会上层，如果处在上层的人不努力，不发挥其能力，也没有多大社会贡献，就会由上层掉入社会下层，那么，这就容易形成一种促进创新的社会体制机制。

协调，讲的是发展布局以及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它既涉及到区域、城乡、部门、行业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还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其中所讲的“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当然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关系，都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正确处理这些重大关系，是我国发展制胜的重要法宝。要正确处理好这些重大关系，从哲学来看，需要运用好唯物辩证法，照辩证法办事。

绿色，讲的是发展质量，主要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破坏自然环境的发展不是有质量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我们应实行的发展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这里的有质量，其中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共生，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此基础上，当今我们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就是在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前提下的发展。

开放，讲的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主要涉及到的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世界发展的轨道，它要融入并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融入并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进程中，中国发展起来了，同时也对世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当今，整个世界处在一个交融交流交锋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如何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尤为重要。开放，是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根本途径，也是营造良好发展的国内外环境的重要方面。在开放中，我们既要利用西方先进文明成果，同时也要警惕种种“陷阱”。当今我们所讲的开放，既是双向开放，又是全面开放，也是更高层次的开放，还是协调共进、互利共赢且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开放。

共享，讲的是发展目的，主要涉及的是人与发展的关系。在一定的时期，发展的成果既要用来扩大再生产，也会为一部分人享有，但最终还应当以人民为中心，为全体人民共享。应当说，用来扩大再生产和为全体人民共享是正途，尤其是我国相对发展起来以后，更应强调使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群众史观。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由上看，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涉及的都是发展中最基本的关系、最基本的方面，因而它关系着发展全局。

关系发展根本——体现对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

五大理念也关系发展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发展规律。遵循发展规律，主要是遵循自然法则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的执政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

遵循自然发展规律来讲发展，必然提出绿色发展理念。自然发展规律，就是人和人类社会应是在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实现发展，这样的发展才是真正遵循着自然本性和自然生态的发展，也才是可持续的发展。以破坏和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既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又污染了人的身心，最终会葬送发展成果。中外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发展一定要遵循自然发展规律。西方提出的新发展观，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目的都是为了防止发展进程中自然环境所付出的代价。

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来讲发展，必然提出创新发展理念。经济发展首要追求的是效率和物质财富积累。追求效率和积累物质财富有两种基本路径或模式：一是主要依靠人以外的“物”来推进经济增长，如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二是主要依靠“人”来推动经济发展。一般而言，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是依靠人以外的“物”来推进经济增长。历史来看，这种依靠“物”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路径和模式功不可没，也具有历史必然性。但这种路径和模式之代价越来越大，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发展道路越走越窄。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必将走向主要依靠“人”来推进经济发展。这种发展就是当今我国所讲的，走向创新驱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其核心，就是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和创新人才培养，注重人力资本投资，注重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育。在这种情境下，就必然提出创新发展理念。

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来讲发展，必然提出协调发展理念。一个社会的发展，既要注重发展活力，也要注重发展各个方面的平衡与和谐。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活力，就好比一台没有马达的机器，如果失去平衡，就好比一批脱缰的野马。实现平衡与和谐的根本途径，就是注重发展各个方面的协调性，用协调发展实现平衡与和谐。

遵循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来讲发展，必然提出开放发展理念。任何一个国家在逐渐发展和强大的进程中，必然走向开放。古代中国的唐朝在发展进程中建立起来的“丝绸之路”，就是一种“走出去”的开放；当年欧洲国家在走到强大的发展进程中“走出去”了，但这种“走出去”，要么是建立殖民地，要么是侵略别的国家；美国在走向发达、强大的进程中也“走出去”，既在全世界建立军事基地，又在全世界实行美元霸权，还向全世界输出自己的文化，进行文化殖民；当今我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也必然遵循这一世界历史发展规律，要“走出去”。当然，我们的“走出去”不是建立殖民地，不是输出过剩产能，不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而是实现互利共赢、和平发展。

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来讲发展，必然提出共享发展理念。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根本价值取向，是实现共同富裕，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在

其自身发展过程中，首先要创造其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甚至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条件下，人主要为创造和积累物质财富做出某种牺牲，但当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人便有享有物质财富的内在冲动和需求。当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时候，他会在其拥有获得感的同时，更加认同社会主义，更加认同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更能使其人生出彩。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讲的共享，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这种共享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

关系发展长远——体现由大国成为强国对发展的要求

大国与强国，对发展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在由贫穷走向温饱再走向小康这一历史进程中，目标是要把我国建成一个大国。1978年以前，我国发展相对落后和贫穷。由于我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也由于“时空压缩”，我国便实行追赶或赶超战略，目的是抓紧“做大蛋糕”。在这一时期，国家集中资源和力量快速发展经济并积累社会物质财富，就成为首要目标。然而，那时，我国人才资源不足，也缺乏创新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开发自然资源、办一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工厂、资本投资和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来拉动经济，即发展经济注重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集中国家资源和力量先使一些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也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和实践证明：这种经济发展路径，确实使我国以发展的高速度换来了发展时间，也拓宽了我国发展空间，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发展中的代价出现了，自然环境被污染了，发展出现了不协调，甚至一些地方出现了畸形发展的情境，一些人缺乏对发展的获得感，这既影响创新活力，也影响社会和谐。自从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相对发展起来以后，我国就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由大国成为强国，由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我国相对发展起来以后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就必须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我国发展全局进行顶层设计。“五大发展理念”，就是在我国相对发展起来以后，即在由大国成为强国、由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全国发展全局进行的顶层设计：在发展动力上，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在发展布局及其基本要求上，由不协调发展走向协调发展；在发展质量上，由以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走向绿色发展；在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上，由单向开放式发展走向双向开放、全面开放、高端开放、协调共进、互利共赢式发展；在发展的目的上，由一部分人缺少获得感的发展走向人人拥有更多获得感的发展。

关系发展短板——抓住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的矛盾、问题和短板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既是影响“十三五”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顺利实现的五大决定性因素，也是贯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且引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核心理念，还是使我国由大国走向强国的发展之道；同时，也是新常态背景下实现“十三五”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所存在的五大“矛盾、问题、短板”。这五大因素既“重要”又是“短板”，可见这五大因素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创新”，表明的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国要积极克服人与社会环境的矛盾，即社会环境还满足不了人们对创新需求的矛盾。缺乏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是实现“十三五”规划、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存在的第一个根本问题和“短板”，由此，我们要努力使社会为激发人们的创新活力，提供制度供给、组织供给、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分配供给、文化供给和社会环境和社会流动机制供给。“协调”，表明的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国要积极克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不协调，是实现“十三五”规划、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存在的第二个根本问题和“短板”，由此，我们要按照全面协调的基本要求，在实践上为协调发展而竭尽心力。“绿色”，表明的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国要积极克服人与自然的矛盾，即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是实现“十三五”规划、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存在的第三个根本问题和“短板”，由此，我们要为建设美丽中国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付出艰辛努力。

“开放”，表明的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国要积极克服中国与世界的矛盾，即世界一些国家对发展的围堵打压，并挤压中国在世界上的发展空间。目前我国的开放还是低层次的开放，“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水平还不够高，高端开放程度还不够，互利共赢式开放也有待加强。这是实现“十三五”规划、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存在的第四个根本问题和“短板”，由此，我们要为单向开放式发展走向双向开放、全面开放、高端开放、协调共进式开放、互利共赢式开放而积极努力。“共享”，表明的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国要积极克服人与发展的矛盾。一些人对发展成果还没有更多更好的获得感，是实现“十三五”规划、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存在的第五个根本问题和“短板”。由此，我们要基于公平正义，积极努力做到使全体中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关系发展方略——体现“人民共创共进共生共赢共享”的哲学思想

创新谓之“共创”，体现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协调谓之“共进”，体现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人与人之间协同共进；绿色谓之“共生”，体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开放谓之“共赢”，体现为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互利共赢；共享谓之“共建共富共享”，体现为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这里讲的“共创、共进、共生、共赢、共享”，体现着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以人民为中心，因而其蕴含的哲学思想是“人民共创共进共生共赢共享”。“创新”的首要目标是创造社会财富或社会成果，“共享”的实质是使人民共享其创造的社会财富或社会成果，创新为出发点，共享为落脚点，所以，“创新”和“共享”是这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关乎发展方略，可简称为“人民共创共享”。由此，“五大发展理念”蕴含的哲学思想是“人民共创共享”。这一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哲学思想在我国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部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

韩星

来源：《光明日报》 2015年9月25日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上自伏羲、炎、黄、唐虞及夏、商、周三代，下至唐、宋、元、明、清以至今日，浩浩荡荡，川流不息，绵延了五千多年，而且在东亚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儒教文化圈”，也可以叫“筷子文化圈”、“稻米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构成其要素的主要有汉字、儒家思想、律令制度、佛教、道教等几项，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极。为什么中华文化能够这样绵延不绝、一脉相传地发展到今天？这可能与独特的地域环境、生产方式、民族心理素质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许多核心价值观。今天，这些传统价值观念依然是我们实现民族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是我们应对挑战的最高行为准则。现在，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应该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这就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固有根本，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今天，我们要讲清楚这个根本才能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从这个源泉里汲取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才能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源”和“流”的关系，“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应该在“继往”的前提下“开来”。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 24 个字，凝练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 24 个字其实是 12 个价值观，其中有的是传统价值观的全部继承，有的是部分继承。下面逐个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做一简单的分析。

富强——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几个强盛的历史时期，就是所谓的盛世。分别是：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东汉时期的光武中兴、大唐时期的贞观之治、盛唐时期的开元盛世、清朝时期康乾盛世。这几个时期，总的来说，都是君主贤明，纳言听柬，体恤民情，爱民如子，臣子直言进谏，尽忠侍主报国，君臣上下团结，社会稳定，人口增长，经济繁荣，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一度出现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定局面。当今中国与西汉文景之治颇有相似之处。

民主——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民本实质上是以民为社会、国家的价值主体，民本是传统文化优秀的核心价值观之一。由于历史局限性，儒家的民本思想不得已与君主制结合在一起，有人认为君主与民本存在着矛盾，即便如此，也潜含着从民本走向民主的种子。

文明——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又称为“华夏文明”：

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

今天的社会主义文明当然首先要继承几千年的礼仪道德，在确立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主体的基础上吸收消化外来文明，同时以自己文化传统为主体来参与世界多元文明的融合。

和谐——和谐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没有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和谐思想内容非常丰富，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天地人（宇宙）的整体和谐，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身（内在精神世界）关系的和谐。面对现代社会严重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协调发展，这些和谐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现代价值，都是我们今天需要着力实践的。

自由——中国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但不能说没有自由。中国古代的自由是一个中性词，指一种摆脱或超越了社会习俗、礼仪规范或正式制度的个人自在自得的存在状态或随情任性的行为方式。道家是中国古代自由的代表，庄子的《逍遥游》等名篇为“自由”奠定了思想基础。相比较而言，中国古代“自由”一词主要被从否定意义上来理解和定位的。儒家的自由是一种中道自由，儒家提倡中正平和，不要走极端，注重伦理秩序，但也不乏自主人格和自由精神，如孔子的“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自由的最高境界。当今中国的自由诉求主要在制度层面，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会逐步实现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实现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人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平等——很多人说中国古代是专制社会，封建等级社会，没有平等。这是表面的看法，中国古代社会确实是一个讲究礼法的亲疏远近、尊卑贵贱的等级社会，但这种等级是在承认人的自然差别情况下的合理合情的等差，在大、小传统中均不乏对平等的思想主张和要求，如儒家在承认人有天然差别的前提下主张人格平等，这特别体现在孔子以“忠恕”为核心规范的仁学思想中，“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恕之道”是在把他人视为与自己在人格上平等的前提下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在它后面隐含着的是一种“人格平等”的精神。儒家之所以要求视人如己，平等看待，又是与儒学恻隐之心，仁者爱人的价值核心分不开的，这一点，孔子的“仁者爱人”与孟子“恻隐为仁之端”的思想就是清楚地说明。当今中国的平等主义是外在制度和法律层面的落实问题，需要我们不断的争取。

公正——可以分解为公平和正义。公平是“一碗水端平”、“不偏袒”的意思，《管子·形势解》：“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在现实中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公平一般靠法律和协约保证，由活动的发起人（主要成员）制定，参与者遵守。“正义”在传统语境中是公道正直，正确合理的意思，如汉王符《潜夫论·潜叹》：“正义之士与邪枉之人不两立之。”现在因为受西方罗尔斯正义论的影响，有学者在通过对“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尤其是“儒家制度伦理学”思想资源的发掘，重建“中国正义论”，以回应“西方正义论”，为解决当代社会正义问题提供中国传统思想资源。

法治——“法治”一词很早就出现在古书中。《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在先秦法家注重法治，但完全否定了儒家的德礼之治，走向极端。儒家自孔子挖掘古代王道政治的思想资源，提出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治道体系，朱熹《论语集注》云：“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认为“刑”、“政”是实现“治”的辅助方式，而“德”、“礼”则是实现“治”的根本的，而“德”又是根本的根本。所以，在中国古代，法治不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而只是治道之一个层面。还需要辨别“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简单地说，我们现在理解的人治是领导说了算的“一言堂”，与独裁、专断联系在一起，而古代的“人治”主要是指贤人之治，通过选贤任能，让贤能执政，制定法律制度。

爱国——爱国主义是我们几千年的优秀传统，已有很多讨论，此略去不论。

敬业——敬业的意思就是专心致力于学业或工作。《论语·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春秋时期，孔子带领学生周游列国讲学，来到楚国叶邑，叶公沈诸梁接待了他，他对孔子不怎么了解，就悄悄地问子路，子路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他。孔子事后得知就对子路说以后就说了这段话。表现出孔子致力于讲学传道，自强不息，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他老人家批评那种整天吃饱饭，不动脑筋，不干什么正经事的人，《论语·阳货》：“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整天吃饱了饭，不肯动脑筋去做点事，这种人是很难造就的啊！

诚信——在中国古代更是随处可见，反复强调。诚信可以说也是以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之一。关于“诚”，《礼记·中庸》就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诚”是天的根本属性，努力求诚以达到合乎诚的境界则是为人之道。又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认为一切事物的存在皆依赖于“诚”。孟子也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又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认为反省自己以达到诚的境界，就是最大的快乐。荀子虽“不求知天”，但也把“诚”看作是进行道德修养的方法和境界。儒家把“信”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关于“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其何以行之哉？”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在世上就会寸步难行。子贡问孔子如何从政，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回答说：先去食后去兵，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汉儒把“信”列入“五常”之中，成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当今中国由于百多

年来割断了传统文化，遗失了诚信价值观，造成诚信缺失、不讲信用，不仅危害经济社会发展，破坏市场和社会秩序，而且损害社会公正，损害群众利益，妨碍民族和社会文明进步。

友善——本意是指朋友之间的亲近和睦，后来泛化为对人乃至天地万物的友好与善待。儒家推崇的核心价值观以“仁”为核心的核心。仁的推衍是以同心圆的方式，由善心——自爱——爱亲人——泛爱众——爱物，仁者与天天问我为一体。友善是仁爱推广到泛爱众和爱物层面的具体表现，是中国人难以舍去，无法泯灭的道德规范之一。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当今中国人由于百多年来隔断了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不讲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国人的素质堪忧，且不说在国内，这几年突出地是国人出境旅游现代不文明，不友善的行为，使人们发出了《做文明、守法、友善的中国人》的呼吁，提出“友善是敲开心房的钥匙。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声感谢，平凡的点滴往往会意想不到地拉近心与心的距离。”“我们应以良好的修养，展现自尊自信，热情坦率、以礼相待，在友善他人的同时赢得尊重。”

30年来，经济改革，人民生活提高，国家综合实力长足进步，社会的开放度与自由度有相当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关系到中国整体的“软实力”，关系到中国能否真地富强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现在，如何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必须扎根中华历史文化土壤，注重传承汲取传统价值的精华，以传统价值作为基本资源，进行新新诠释，赋予新内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推进社会文明，走向世界大同的巨大力量源泉，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一带一路”的三大主力军

赵可金

来源：中国网 2016年5月29日

中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也是“一带一路”的积极推动者、实施者。庞大的中国经济总量和超大规模的人力资源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物质基础。其中，以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和环渤海经济区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和港澳台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具有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和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是整个“一带一路”倡议动力源头。如何发挥沿海和港澳台地区的先发优势和引领功能，使之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

沿海地区：“一带一路”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目前，人们对“一带一路”存在一种误解，认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是新疆和福建两个核心区，很多人要么将“一带一路”理解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更多分析沿线国家存在的政治风险和各方面的挑战，要么把目光更多锁定在西部地区，从历史上的古丝绸之路着手，分析复兴古丝绸之路的种种方案，将“一带一路”理解为一种对西北边境地区的对外开放，误以为是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反向补贴和政策优惠。其实，这些看法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诚然，如同3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首先从东南沿海启动一样，“一带一路”重点建设西北边疆地区，注重打通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陆经济通道，实现互利共赢。但是，无论是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福建，还是东北、西北和西南经济实力更加弱小的诸省区市，根本无法扮演“一带一路”的龙头角色，它们不仅缺乏发挥引领作用的经济能力，也缺乏扮演龙头角色的开放视野、开创能力和体制机制。尽管中央已经在新疆和福建两省区设立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但从两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让它们引领整个“一带一路”建设工作，恐怕是要求过高了。就目前来看，新疆和福建除了通过自身体制机制的大胆改革创新盘活自身一盘棋外，其他的基本上无法指望，更何况新疆还面临暴力恐怖主义、政治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的严峻挑战，在南疆面临着不是引领“一带一路”的问题，而是如何维护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问题。福建的情况尽管要比新疆好得多，但要想让福建引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这样势力雄厚的经济圈，也无异于是“小马拉大车”，很难有大的作为。在此，我们完全没有否定中央设立丝绸之路

经济带核心区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战略决策的意思，也没有有意贬低或看不起两省区的改革创新能力的意思，只不过从实事求是的精神出发，两省区更适合做好自己的事情，因为两省区的改革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成功了固然很好，一旦失败了也不应影响中国发展战略的全局，“一带一路”最好不要押宝在两个核心区的探索和创新上。

既然新疆和福建两省区以及中西部各省区无力胜任“一带一路”龙头和引擎的角色，谁可以承担这一角色呢？毫无疑问，就“一带一路”倡议整体而言，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其统领的整个中国经济应该是“一带一路”的龙头，中央“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是“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总指挥部”和“总前委”，所有重大方针政策和实施方案要从这里传达到各个部委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依靠党、政、军、民、商、学、媒等社会各界，团结海内外一切愿意参与的力量，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然而，具体而言，在中国经济总体布局中，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为核心的东南沿海各经济区，包括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区、舟山群岛新区、浦东新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天津滨海新区等东南沿海地区众多经济活力强劲的地区，经济总量占据了全国的七成以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扮演龙头和引擎角色。同时，这些地区与港澳台、日韩、欧美等发达经济地区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对整个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体系有着灵敏的反应，如何发挥沿海地区的先发优势，在自身扩大开放和转型升级的同时，带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展开，将是新常态下沿海地区对接“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认真对待和高度重视的战略课题。

在国务院授权三部委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中央对沿海地区在“一带一路”规划中的定位是“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引领”，“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从中央的定位来看，“一带一路”建设的火车头还是确定在沿海地区，并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将发展重点完全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只不过对东部地区而言，核心问题是通过深层次改革实现转型发展的问题，沿海地区要调整现有过多中低端产业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更多向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和国际竞争的蓝海地带进军，建设具有世界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经济增长极，这是“一带一路”总布局对沿海发达地区的总要求。具体来说，所谓“排头兵”，是指沿海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走在国内各省区市的前列，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前列，主动通过扩大开放倒逼自身深层次改革，在与当今世界最发达国家和地区竞争过程中形成“一带一路”的新优势。因此，沿海地区不仅要“一带一路”的排头兵，而

且还要做与发达经济体竞争的排头兵，两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所谓“主力军”，是指沿海地区还要承担“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方面承担更多的项目，发挥更大的作用，形成链接东中西、沟通境内外的经济大通道。很明显，尽管“一带一路”意在调整发展布局，重在振兴中西部地区，但沿海地区仍然是实现“一带一路”构想的王牌，是主要的依靠力量。沿海地区对于这一点必须心中有数，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勇挑重担，切实履行和发挥好引领作用。

三大主力军：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发展水平上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经济圈，尽管土地面积并不大，但人口密集，经济产出效率和集约化程度都非常高，很多省市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在投资、出口和消费的拉动下，沿海地区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全球经济大循环之中，成为拉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极。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环渤海湾城市群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扮演着链接中国本土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枢纽和桥梁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海地区需要调整角色，除了继续扮演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枢纽之外，还要扮演“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角色，特别是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三大主力军，可能决定着“一带一路”的进展乃至未来。同时，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各有其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等特色，三大经济圈在发挥“排头兵和主力军”作用不可能平行用力，需要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彼此呼应，分别从南方、东方和北方三条战线展开，沿海路和陆路两个维度延伸，如同两个巨大的经济发展翅膀，驱动“一带一路”在欧亚非三大洲和太平洋与印度量的两洋范围内展开，稳步构建链接欧洲经济圈和亚太经济圈的跨区域经济合作圈。具体来说，三大经济圈可能在“一带一路”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一是作为资金融通和设施联通主力军的长三角经济圈。

长三角经济圈是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副中心，约 30 多个城市组成的经济圈，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经济实力最雄厚和最具活力的地区。该地区从 1992 年开始加强江浙沪协同发展，建立了 15 个城市间合作机制，到 2010 年国务院批准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镇分布最密集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际化城

市群和增长极。在 2014 年，全国 GDP 超过 63 万亿元，仅长三角核心区 16 个城市就贡献超过 10 万亿元，被国际公认为当今世界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与其他两个国际化城市群经济圈相比，长三角经济圈最大的特点是有着超一流的基础设施条件、雄厚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和国际化水准的现代服务体系，是国际资本投资青睐的“天堂”。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纷纷确立“转身亚太”战略的背景下，长三角经济圈成为跨国公司、国际财团和研发中心聚集的所在地。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长三角经济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都市群经济圈，成为和伦敦、纽约相媲美的世界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鉴于长三角经济圈所具有的各方面优势，应该将该地区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承担设施联通和资金融通任务的主力军。

首先，打造长三角经济圈为“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主力军。尤其是作为长三角经济圈核心城市的上海，中央在上海设立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并明确指示希望上海成为全国开放度最高的自贸试验区，发挥“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角色，成为吸引全世界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强大磁极。重点是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推行货币自由流通，打通上海证券交易所与香港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等世界各国证券交易机构的联系，逐步推动上海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推动上海在构建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其次，推动长三角经济圈成为引领“一带一路”设施联通的主力军。长三角经济圈在基础设施上与世界链接最为紧密，浦东机场、虹桥机场是链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枢纽机场，洋山深水港、宁波-舟山港是国际集装箱运输运力最大的港口，在通信、能源、新能源、高科技技术等领域，长三角经济圈不仅是国内水平最高的，在世界上也位居前列。但是，受体制和政策的原因，长三角经济圈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联系却并不十分紧密，尤其是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上存在落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落差就更大。因此，“一带一路”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起点可能是从国际化水平最高的长三角经济圈出发，打通从西太平洋沿海到北大西洋沿海的经济大通道，为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扫除障碍。

二是作为贸易畅通主力军的珠三角经济圈。

珠三角经济圈背靠内陆腹地，面向南中国海，包括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等城市群，辐射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并与港澳紧密融合，是一个有着崇商重侨传统的经济圈。与长三角经济圈不同，珠三角经济圈有着毗邻港澳台和背靠东南亚的地缘优势和华侨之乡的人缘优势，呈现出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个大城市驱动的城市群格局，尽管在经济实力上比不上长三角经济圈，但各个城市之间互联互通，联系方便，市场化程度高，

以“三来一补”、“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起步，吸引了大量以服装、玩具、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外资进入，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日用消费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是中国经济国际化和外向度最高的地区，外贸依存度超过 150%以上。世界银行 2015 年 1 月 26 日公布，中国珠江三角洲已在 2010 年超越日本东京，成为世界人口和面积最大的城市带。尤其是随着 2014 年广东自贸区的设立，珠三角经济圈的国际化将获得进一步加速发展。

因此，鉴于珠三角经济圈拥有贸易国际化的巨大优势，应充分利用其商业网络优势，加强与内陆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联系，推动珠三角经济圈成为“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主力军。要积极推动珠三角经济圈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推动广交会等展会平台转型升级，加强与欧美、亚太等世界各地的商品交易所对接，建设高水平的“一带一路”商品交易平台、拍卖行、典当行、物流中心贸易体系，增强带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能力。同时，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畅通，在数据共享、自动报关、检验检疫、监管体系等方面推进互联互通，切实增强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激发和释放合作潜力。

三是作为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主力军的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圈。

环渤海经济圈位于中国北方渤海周围，涵盖了京津冀、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省市，区位优势特殊，工业密集，城市弥补，是中国首都经济圈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门户。与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相比，环渤海经济圈国际化水平低，发展也不够均衡，北京与天津发展要明显快于山东、辽宁与河北，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高，特别是以重化工—资本密集型的国有资本企业占主导地位，是中国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不过，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圈最大的特点是政治资源和人文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尤其是 2014 年 2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把京津冀计划作为国家战略，通过科学规划和顶层设计，推动首都经济圈的一体化。2014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把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群协作列为当年一项重大任务。随着京津冀协同以及环渤海与京津冀地区经济群协作的启动，必将对“一带一路”的北线和中线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因此，从京津冀协同和环渤海经济圈协作的特点出发，应该着力发挥这一经济圈在“一带一路”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的主力军作用。其中，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都十分丰富，要通过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和发展服务等渠道，举办各种政策论坛，完善对话机制，举办社会文化活动等，创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沟通交流的机会，在交流中实现

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同时，京津冀协同和环渤海经济圈协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区域内陈规难破、市场分割严重、经济发展缓慢和彼此之间协作不足的问题，要想释放该地区在“一带一路”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的活力，必须致力于打破壁垒，增强互动协作，从政治、经济、人文等各个层面搭建合作共进的 platform，形成规模优势。其中，最主要的是加强与蒙古、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的联系，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环渤海经济圈协作发展的互动，增强“一带一路”北线的带动能力。

重在打造经济增长极

总体来看，尽管中国三大经济圈各有优势，但在对接“一带一路”上存在着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行政体制分割引发的地区间恶性竞争、不同区域存在的贸易壁垒和花样翻新的地方保护以及资源配置不合理和特色不明显等。由于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主权国家，这些问题在中国发展战略全局中只要不引发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可以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但是，随着“一带一路”的启动，如果还存在此种自相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的情况，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伤及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信任度。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整合中国三大经济圈的特色，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致力于打造“一带一路”的区域增长极。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是提升核心城市的引领效应。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三大经济圈中，都有其发挥引领作用的核心城市，比如长三角经济圈的上海、珠三角经济圈中的广州、环渤海经济圈中的北京和天津等，三大经济圈能否真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归根结底要看核心城市的引领效应发挥得好不好。以上海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经济圈的发展是与上海浦东新区开放开发紧密相关的。在1991年以来的浦东开放之中，第一轮开放是土地批租和招商引资，表现为设立开发区，上新项目。第二轮开放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现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搞资本兼并，资本运营。此次“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可以看做是上海的第三轮开放，主题是资本开放，包括探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和取消对外商投资准入现值的投融资制度改革、通过要做强做大股市和积极对接华尔街金融体系，以股市开放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上海股市，推高股市，为中国企业提供优越的融资环境，培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世界500强企业，以及探索建立离岛金融区的问题。总之，展望未来，上海和长三角经济圈应“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重点不是招商创业，也不是推动探索自由贸易，而是建设金融创新服务区。要借自贸试验区之名，探索金融创新区之实，上海的出路在金融，上海的竞争力也在金

融。因此，上海要确立“金融强国”的战略，以金融创新带动其他一切领域中的创新发展，打造上海国际化战略的升级版。

二是提升三大经济圈的协同效应。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想发挥三大经济圈的引领效应，紧靠某一两个省是不够的，必须大力加强区域内的协同整合，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追求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要通过制定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规划，制定“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长三角经济圈协同发展规划”等，明确经济圈协同发展的目标和发展路线图，以公路、港口、机场的衔接配套和交通、物流网络的完善为重点的基础设施一体化，以强化信息资源互通共享的信息一体化，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态完善城市功能的城市布局一体化，最终推动建设区域内的一体化商品物流共同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人力资源共同市场、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保护共同市场、基于信息网络平台的信息共享及信用征信共同市场，以及文化旅游共同市场等。惟有将共同市场的协同效应释放出来，才能转化为“一带一路”的带动效应。

三是提升三大经济圈的带动效应。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自中国国家发展的全局中，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实际上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是对外连接发达国家，扮演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门户角色，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一地区已经被纳入整个国际资源配置的大循环，成为追随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二是对内连接内陆腹地，扮演着拉动中国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角色，成为面向内陆腹地的辐射中心。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沿海和港澳台地区的这一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仅仅是全球经济的追随者，而是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领导力，也不再仅仅是内陆幅度的引擎，也具有拉动整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引擎效应。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要求沿海和台港澳地区转变传统的角色定位，在继续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同时，更强调确立主动进取，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总之，“一带一路”能走多远，能走多快，从根本上取决于市场拉动力和政府引导力。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还是取决于东部沿海地区引领带动效应释放的情况。在这一过程中，欧洲经济圈和亚太经济圈的市场发展需求对接、“一带一路”新发展理论的指导以及中国政府与沿线国家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三者缺一不可。从目前情况来看，所有这些努力还刚刚起步，首要的还是大力深化相关理论研究，搞清楚区域内一体化和

跨区域协作之间的关系，为增强三大经济圈的带动能力提供理论指导。当然，在理论没有搞清楚之前，“一带一路”也需要从干中学，边实践、边总结、边提炼，因为“一带一路”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一定是在实践中走出来的，不是在书斋里论证出来的。

（作者为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